

B 白城记忆

辽朝时期的白城

●宋德辉

从公元907年契丹建国到1125年辽朝灭亡,这一时期是辽朝统治时期。辽朝时期是白城历史上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辽建国初期,为了加强对白城及周边这一区域的管辖,在今天的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设置了白城这一区域历史上第一个州级政权机构——泰州。辽泰州的建立,不仅结束了白城及周边这一区域没有地方政权建置的历史,而且使这里成为包括今天吉林省西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省西部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此,也掀开了白城历史崭新的一页。

契丹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悠久历史,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族。辽朝是以契丹民族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所建立的多民族的政权,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朝代之一。它建立于唐朝灭亡之后,大体上与五代、北宋政权相始终,它的建立使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南北朝局面。它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当时中国东北、北方的开发与建设,开拓和稳定北方疆域,特别是对于加强东北、北方同中原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促进祖国统一的各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辽朝的建立与对白城的管辖。
唐朝末年,即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契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契丹族最后完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从部落联盟到国家的过渡。

这个历史任务是由迭剌部酋长耶律阿保机来完成的。耶律阿保机利用唐王朝的衰亡,防御力量削弱之机,积极发展经济,展开了更大规模的俘掠奴隶的战争,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政治权力,终于将氏族制推向了尽头,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奴隶制剥削方式的奴隶制国家,实现了对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统一。

公元907年,契丹新兴势力代表耶律阿保机推翻遥辇氏部落联盟痕德重可汗的统治,结束了契丹族从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400多年的历史,揭开了契丹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公元916年春,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八仙筒一带)东“金岭岗”辟地为坛,称帝建国,接受百官和诸国使臣上给他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尊号,上给皇后的“应天大明地皇后”尊号。接着阿保机宣布大赦,建元“神册”。从此契丹国开始有了正式年号,这一年即为神册元年。契丹正式建元,是契丹人依照中原王朝模式建国又向前跨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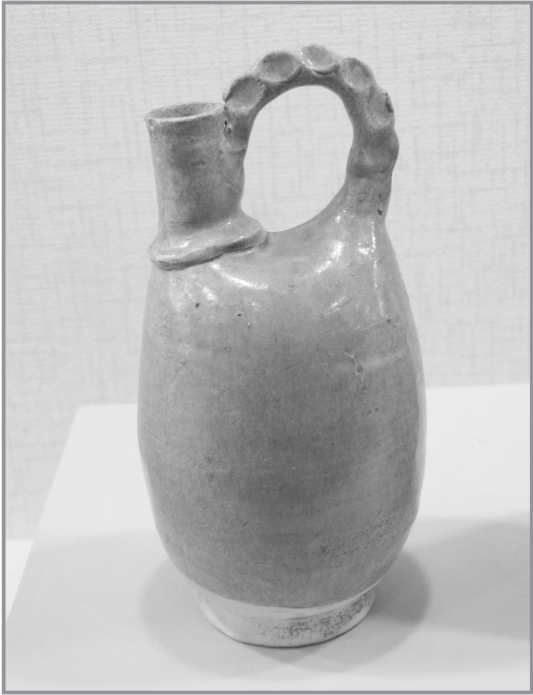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到公元947年(大同元年)耶律德光改国号辽,契丹奴隶主贵族继续不断地向四周扩张,终于占据了包括燕云十六州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区,据《辽史·地理志》载:辽之疆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肭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实现了对北部中国的统一。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生活着契丹、奚、汉、渤海、女真、室

韦诸族人。他们虽然被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但其社会经济结构却不相同,有的从事畜牧生产,有的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从事半渔、半畜牧业生产。其社会发展形态也各异,有的处于奴隶制阶段,有的处于封建制阶段,还有的仍旧停留在原始氏族制阶段。如契丹族和居住在北部的其他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奴隶制阶段,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不定居游牧生活。在南方包括渤海、女真族在内的汉人地区,已进入了封建制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手段的时期,过着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的定居生活。而对这一复杂情况和不平衡局面,契丹统治者根据各族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同的特点,创制了一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和政策,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办法是: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一律由契丹贵族统治,称为北面官。负责“官帐、部落、属国”和“兵机武选(选拔武官)群牧”等军政事务。统治汉人、渤海人的则采用汉人地主和契丹贵族,称为南面官,凡属“汉人州县,租赋、军事之事”和“文选(选拔文官)、丁赋之政”都由他们负责。同时,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采取

州县制,经济落后地区采取部落制统治。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辽朝以契丹人为主体的统治各族人民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维护了辽王朝统治在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北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白城位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东北部,属契丹族核心区的边缘地带。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霍林河(在辽代称“燕支河”、“郝里河”,金代称“鹤五河”),洮儿河(称“挹鲁河”、“长春河”;金代称“挹鲁古河”);嫩江(在辽代称“纳水”),在流经白城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特殊的地理环境。西北部是长满了落叶松、白桦树的原始森林地带;西南部是柳、榆、杏、桑相间的沙地草原地带;中部、东部是广袤的草原地带,还有众多的河汉、泡沼和季节性河流。这为以游牧为主的契丹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同时,这里也是进出大兴安岭的三条主要通道和北御室韦,东防女真的战略要地。

辽代初期,这里是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契丹二十部族是当时契丹所有部族的统称,是在原有契丹八部基础上,随着



辽代鸡冠壶



辽代契丹纹铜镜



鸡腿坛

诗词鉴赏

浣溪沙

游蕲(qí)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宋] 苏轼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赏析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官于黄州时所作。当时,他病后初愈,与友人同游蕲水城外的清泉寺,感慨于途中所见景物,遂写了这首词。

清泉寺邻近兰溪,溪因水畔兰草丛生而得名。兰草多生于幽谷中,可见清泉寺其地之清幽。词作上片写景,为游览之所见。溪水潺潺,蜿蜒流到山下,兰草的嫩芽,刚刚露出水面,浸在溪水中,显得水流格外清澈;踏着松间沙路游玩,路面洁净湿润,了无尘滓,大概都被流水冲刷干净了。这两句描写的景物是明朗而清新的,但接下来就带着点忧伤

的调子。傍晚,细雨潇潇,传来布谷鸟的悲啼。此景此声,在身处贬谪地、又大病初愈的词人听来,不免生出出世无常、“人生无再少”的感慨。但苏轼向来心胸豁达,善于随缘自适,一旦心中有了消极的苗头,那个积极的“自我”就会站出来鼓劲儿。于是就有了下片的议论。诗人首先做出否定:谁说人生不能再回到年少岁月?并申述理由:你看那兰溪尚且能向西流淌(一般河水都是东流入海),世事又如何能断言呢?最后给自己打气:还是不要在头白之际自伤衰老了吧。这不啻(chì)青春的宣言,催人自强,令人奋进。诚然,岁月流逝,无法逆转,但此时与其空发感叹,哀戚年已迟暮,倒不如振作起来,奋发有为,容或有转机之时。即使在困境中,苏轼依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甚至愈挫愈勇,对生活充满信心,这正是苏轼的伟大之处。(雨果)

成语故事

摆袖却金

摆袖却金:比喻为人廉洁,不受贿赂。

据韩愈《顺宗实录》记载,唐永贞年间,韦夏卿担任吏部侍郎,其族兄韦执谊接受他人的贿赂,替人谋求官职,向韦夏卿的袖中塞金子。韦夏卿正色道:“你我二人有赖先人德惠,方在朝廷为官,怎可如此自坏名节!”说罢拂袖而去。

移小月 凌澄/图文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之三

小孔成像

●苏湛

在一个明亮的物体与屏幕间放一块挡板,挡板上开一个小孔,在屏幕上会形成物体的一个倒立的实像,这种现象被称为小孔成像。

小孔成像现象的发现是早期光学研究中揭示光的直线传播性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也是后世照相、幻灯等技术诞生的物理基础。

成书于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前)的《墨经》最早述及小孔成像现象。在《墨经》的“经下”和“经说下”两篇中记载了一系列关于光线成像、成影以及镜面反射规律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光学问题的论述,小孔成像问题的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此 后,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学者海什木才对小孔成像的原理给出了正确的解释。这一工作与海什木的其他光学发现一样,后来传入欧洲,成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相关研究的基础。

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其中赵友钦还设计了大型实验,他动用上千根蜡烛作为光源,在屋内地面上开凿最深达8尺(约2.6米)的深井作为物距,以从地面到天花板的距离作为像距,对孔的大小与形状、光源亮度、像距、物距等因素对成像效果的影响进行细致的研究,做出了中国古代表小孔成像问题最为系统、完整的论述。

在西方,最早记载小孔成像现象的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他在《问题集》(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中记述了阳光穿过树叶或柳条制品的间隙在地上成像的现象,并尝试对其原因进行了讨论,不过他给出的解释基本上是错误的。此后,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学者海什木才对小孔成像的原理给出了正确的解释。这一工作与海什木的其他光学发现一样,后来传入欧洲,成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相关研究的基础。

我看我说

优秀通俗文艺可成经典

●李云雷

面对既有文学类型敢破敢立、锻造通俗文学历史厚度、高扬精神价值,这或是金庸小说对当前通俗文艺的启迪——通俗不是借口,通俗一样可以成为经典

日前,《射雕英雄传》三部曲英文版第一卷面向全球出版发行,年届94岁的金庸又一次引发关注。出版这么多年,金庸作品在赢得几代人捧读同时,在国外亦有众多读者,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对方兴未艾的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艺来说,金庸作品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具有重要启示。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古老类型,从《史记·刺客列传》到《虬髯客传》再到《水浒传》《三侠五义》,中国武侠根脉绵延不绝。近代以来涌现出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赵焕亭、郑证因等众多武侠小说名家,香港新武侠小说正是在此脉络上别开新枝,出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大家。金庸最重要的贡献是汲取古今中外文学滋养,对武侠小说这一传统文学类型进行现代改造,凭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新武侠小说“集大成”。

传统武侠小说大多篇幅短小,即使有长篇如《水浒传》《三侠五义》等,某种程度上也是短篇故事的连缀,在结构上不是很讲究,但从近代开始,武侠小说开始注重布局、结构与线索,这在金庸小说中达到一个高峰。我们读《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会进入一个峰峦叠嶂的武侠世界,其构思之精巧、线索之众多、布局之严密,令人叹为观止。金庸不仅在形式上对武侠小说

进行革新,也在小说主题上融入很多现代观念。传统武侠小说主题限于武侠精神、“替天行道”、江湖与庙堂等,但在金庸小说中出现现代个人观念(如郭靖的成长)、现代爱情观念(如杨过小龙女之恋)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如乔峰的家国意识),对于武侠精神,金庸也将之从个人武力、侠义拓展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做出新的理解与诠释——正是这种面对既有文学类型不循旧路、敢破敢立,用新观念和新视角激活更多可能性的艺术魄力,使金庸小说汇聚此前武侠小说历史脉络于笔下,汲取所长,自成传统,在武侠小说史上奇峰突起。此后的武侠小说或正面继承,或反向叛逆,或借鉴其一点而发扬光大,或学习其一处而自成风格,多受其影响。

其类型的“集大成”之外,金庸创作另一经验体现在锻造通俗文学的历史厚度上。虽然当下有不少网络文学写作者奉金庸为“祖师爷”,但他们或者一味架空历史、飘渺于九霄云外,或者打着虚构名义随意编造,恐怕不会为金庸所认同。与还珠楼主的仙侠、古龙的浪漫化叙述相比,金庸的小说更具现实感与历史感。无论是郭靖、杨过,还是乔峰、韦小宝,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具有触手可及的真实感,他们的身世遭际也更能牵动读者。金庸调动起历史,同时不拘泥于历史真实,而是在历史素材基础上开拓出一片江湖天地,融入浪漫瑰丽的想象,创造出一种属于他的武侠世界。可以说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在技术与艺术之间,金庸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这条

艰难的道路,金庸将之走成了通向经典之路,他那厚重而轻盈、现实而浪漫的艺术世界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

通俗文艺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它契合或唤起人们的潜在欲求。人的欲求有高下之别,通俗文艺也有高下之别。武侠小说中不乏渲染暴力、血腥、色情之作,金庸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他超越低层次的博人眼球之举,举起并且提升读者心中的精神向往,因而雅俗共赏,赢得广大读者——金庸小说受到几代读者欢迎,这种欢迎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他小说中的精神文化气质深深吸引并且滋养着读者。比如侠义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之一,金庸小说就彰显这种侠义精神,并将这一民族无意识以现代方式呈现出来,塑造出众多风采各异的大侠,成为读者雅俗共赏、心向往之的文学符号。这种对精神价值的高扬、对文化意义的追求或许是金庸小说对当前通俗文艺的最大启迪。

金庸作品好看却难学,因其通俗不是一味向下的“流俗”,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净化欲求与精神的“通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庸的通俗以广博的学识做根底。他一直在治学充满兴趣,2010年以86岁的年龄于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作品中深厚的人文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来自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金庸小说曾两度修订。自1955年于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开始,至1977年于《明报》刊载完《鹿鼎记》为止,报上的连载或结集成册的金庸小说,统称为“旧版”,其后,金庸以10年时间细细修订旧版小说,出版“新版”金庸作品集。此后数十年尽管对外宣称封笔,金庸却没有停止检视自己的著作:从2000年至2006年,历经7年的再次修订,最新版金庸小说终于面世。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亦值得今天的通俗文艺创作者学习——通俗不是借口,通俗一样可以成为经典。

